

■ 新人文论

个性·自我·创造

GEXING·ZIWO·CHUANGZAO

■ 李 劫



■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人文论丛书

个性·自我·创造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育海

封面设计 靳 斌

个性·自我·创造

李 劫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80000 印数0001—34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17-7/I·115 定 价: 3.25 元

6.18/37

07

序

这本集子里所收的几十篇文章，都是李劫近三年来所写。三年内能有这些成绩，已经相当不容易，李劫却另外还写了一本《文学是人学新论》（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就更值得称道了。其实，在我们中国，这几年所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象李劫这样的，又何止十百？如果要开列起名单来，那将是长长的一大串。面对这种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人们自然禁不住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从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将近三十年之久的时期内，我们在文学方面所造就的人才是这样的稀少，尤其在理论批评方面，更几乎是除了一、二个专以讨伐为业的“批判家”以外，其余所有的就都只是些被批判的对象了。这是什么道理呢？答案是大家都清楚的。因为文学工作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不承认、不尊重文学工作的这一特性，把文学等同于宣传，限制它的自由，束缚它的创造性，那就无异于杜绝了文学的生机，哪里还谈得到文学人才的培养呢？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历史情况。前车不远，但愿我们今后能不再重蹈覆辙。

李劫把这本集子定名为《个性·自我·创造》，立意可能是在于：张扬个性，尊重自我，呼唤创造。这同当年浪漫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有些相象的地方。李劫本来就是很有一些浪漫主义倾向的，所以他会发出这样的呼声，并非偶然。而我对他的这一呼声，是抱同情与支持的态度的。因为正象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一样，浪漫主义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学不但永远需要现实主义，同样也永远需要浪漫主义。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改革的时代，社会飞速前进的时代，亿万中国人民受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前景的激励，都愿意为加速实现这一目标而贡献出自己所有的才智。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我们的文学很自然地也必然会洋溢起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所以李劫的呼声，我以为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与群众的内心要求相一致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们也曾热情地讴歌过浪漫主义精神，那后果，大家知道是很不美妙的。但那是因为它与当时的政治路线和极左思潮纠结在一起，而且就是这条路线和这种思潮的产物，其过失不能由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来承担。倒是因为过去曾有过这样的失误，我们今天可以引以为戒，随时警惕自己不要重犯这种错误，使浪漫主义的理想精神和创造热情能更好地得到发扬。

也许因为“自我”、“个性”等一向为资产阶级所标榜，他们叫得也最凶的缘故吧，所以在我们这里，对这些字眼常常侧目而视，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不得不提到它们时，也总要在前面加些限制词，以示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对“自由”、“民主”等名词，我们所采取的同样也是这种态度。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近于自己跟自己捣乱。俗话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这批跟自己捣乱的人，却决非庸人，而是一些十足的聪明人。我甚至要说，爱跟自己捣乱的，常常正是聪明人。庸人只凭常识行事，他们可能常常会出错或者上当，但决不会想出种种名堂来跟自己捣乱。只有聪明人，才常常喜欢挖空心思地想出种种花样，为自己（当然更主要的是为别人）设置许多无形的障碍，然后加以超越或者回避，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一般人则因为这些障碍本来是虚设的，莫须有的，并不想到要去超越或回避它们，自然难免会有所触犯，于是指责和讨伐之声也就随之而来。而这些聪明人，则在对别人的指责和讨伐声中，也就愈益显示出他们自己的聪明和高明来了。其实呢，“自我”和“个性”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之物，也不是一提“尊重自我”、“张扬个性”，就必然意味着是要尊重个人主义的自我，张扬资产阶级的个性。更不是所谓“尊重自我”，只要尊重我一个人的自我，而不需要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我；所谓“张扬个性”，就是只许自己张扬个性，而不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有张扬个性的机会。事实上，只有懂得尊重自己的人，才会真正尊重别人；也只有在人人都能发扬自己的个性的社会里，自己的个性才能顺利地得到发扬。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当然是赞成集体主义而反对个人主义的。但“尊重自我”，“张扬个性”，决不是要提倡个人主义。这是两码事，不能把它们牵扯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贡献出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群策群力地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理想才能加速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是不需要靠否定自我、牺牲个性的办法来实现

的。而且实践证明，靠这样的办法，是实现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想用抹杀自我、消灭个性的办法来实现的，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而已。何况现在李劫所谈的是文学问题，文学艺术贵在独创，必须有新鲜的意趣和个人的特色，在文学问题上提出应该尊重自我、发扬个性、努力创造，更是完全无可非议的。

李劫很有激情，他头脑里也很少框框。并不是他不知道有框框存在，而是他不愿受这些现成的框框的束缚，这些框框在他眼里也就视若无睹了。他的文章非常放得开，怎么想就怎么写，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总是称心如意，随笔挥洒，显得很有才气。但也不免因此而时或流于偏激，只图说得畅快，忘记了应有的节制。他笔墨很有文采，好用对偶排比语句，有时为了追求词面的好看，不免有牵意就词，甚至因词造意之弊。不过一般说来，这种毛病并不严重。他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常能自出机杼，直抒胸臆，颇多独到之见。但他的长处，似乎是在直感妙悟一方面，当他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天南海北，纵笔所至地娓娓而谈时，使人感到他的确别具会心，常能显幽烛隐，独造精微。而且兴会淋漓，妙语叠出，读来沁人心脾，使人忘倦。不过，如果他不安于只谈他自己从阅读作品中所得来的艺术感受，所引发出来的美学情趣；并结合这些感受和情趣，说说自己的爱憎好恶，自由地驰骋一下自己的想象，兴之所至地随便发一点忽然想到的议论；如果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离开自己独擅的胜场，涉足到对他来说是比较疏远的领域，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譬如说，他假如要从理论上对文学的规律性问题作一些概括性的科学论断，那他的粗疏，他

的偏激，他的不够冷静的缺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的结论往往下得太轻率，缺乏必要的根据，近于武断。另外还有，一方面他固然很有理论勇气，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很少迷信保守思想，与教条主义似乎是绝缘的。但同时，我又总觉得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某些作家和作品（当然只是某些而决非全部，他也是有分析有选择的）似乎有些偏爱，对它们估价过高，想得过好，甚至把它们奉为典范，并以之作为衡量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这一点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因此不会肯承认。但从他某些文章的字里行间看，的确流露出这种迹象。其实，这些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虽然确有它们的精微独到之处，但决称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典范之作。李劫所认为的这些作品的好处，也往往并不真正存在于这些作品身上，而是他从自己头脑里想象出来后再把它们安放到这些作品的身上去的。正象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常常把自己的意中人想象得比实际更加完美一样。这些地方说明他也受到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的“剧场偶像”的迷惑，他心目中其实还是有权威的。他也有他的迷信和教条主义的一面。本来，说到底，这原是谁人都难以绝对避免的。不过，我认为他的这种迷信和教条主义，是来源于他禀赋中所特有的激情，一种容易流于狂热的激情。他文章中的一些粗疏、武断和偏执的毛病，除了学识修养方面的欠缺以外，我以为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与此有关。我希望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养的日益丰厚，能逐渐克服以上这些缺点。

我一方面很欣赏李劫的才能，但对他的时有流露的偏激情绪，对他的常常容易为某种狂热的冲动所左右的习性，则

不免感到担心和不安，也时常提起他的注意。但我知道，一个人的短处往往是跟他的长处纠结在一起的。短处当然应该加以克服，但如果操之过急，很可能连他的长处也会受到挫伤，使他失去原有的光采和锋芒，那就得不偿失了。人们对李劫的文章常有不同的看法，跟他进行商榷争鸣的也不少。个别朋友知道李劫是我的学生以后，甚至传话要我“管管他”。我对李劫的某些观点也并不同意，但我觉得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的意见总是会有的。尤其在艺术趣味和审美评价方面，更无法强求统一。尽管李劫的某些提法在我看来确实有失偏颇，但也自有他的可取之处，自有他独具只眼的地方，不容一笔抹杀；尤其不能因为他与我的意见不同就贸然判他的不是。只有一次，当我在报上读到他的一篇题为《谢晋时代应当结束》的文章以后，我很不以为然，曾把他找来批评了他。这主要倒不是因为他对谢晋的评价与我的很不相同，而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这种轻率武断的口气，这种对一个作出了重大建树的人缺乏应有尊重的不逊态度。他对当前的电影有什么看法，他对谢晋的导演艺术有什么意见，这都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但决不可以用一种法庭宣判式的口吻说话，也不可以因为要表示一种否定性的意见，就连对象的长处也一笔抹杀。这是我所坚决反对的。我们过去吃这类批评的苦已经够多了，学术文化界之所以几十年来举步维艰，停滞不前，与这类批评风气的流行也是很有关系的。李劫并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他对所谓“谢晋模式”的批评性意见，也决不是重复过去的“左”的一套。但某种情绪方面的偏激和表达方式方面的简单化，也会对批评风气造成不良的影响。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着能有真正的学术上的讨论和争

鸣，现在客观上有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加意珍惜它，为培养、创造一种良好的学术风气而共同努力。

李劫要我为他这本集子的出版写几句话，我就借此机会在这里谈了我对他的许多看法。既谈了他的长处，也谈到他的缺点。这些长处和缺点，当然只是从我眼中看来是如此，未必就真是他的长处和缺点。我自问并没有因为李劫是我的学生，就对他滥施溢美之辞，不惜奖饰过分；也没有因此而对他故意苛求，以显示自己的严格和无私。学术、文章和人才，都是天下的公器，其价值应由天下人来评定，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任何人所得而私的。李劫的文章俱在，相信大家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目前我们国家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正急需大量的有用之才。爱护人才，人人有责，乐于看到青年人迅速成长的心意，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我为李劫和今天所有的青年人感到庆幸。

钱谷融

1987年7月28日

目 录

序

钱谷融

高加林论	1
论舒婷及朦胧诗派	30
舒婷、顾城、北岛及朦胧诗派论	52
观念——文学，自然——人	71
——《黑骏马》、《北方的河》之我见	
刘索拉小说论	82
是临摹，也是开拓	96
——《你别无选择》和《小鲍庄》之我见	

目 录

文化的个性与个性的文化	110
——关于《棋王》和《蓝天绿海》的评论	
具象块面·心理呈示·状态文学	125
——《爸爸爸》和《小鲍庄》的探讨	
动人的透明，迷人的诱惑	144
——论《透明的红萝卜》和《冈底斯的诱惑》	
创造，应该是相互的	155
——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观念	
中国新文学主潮绪论	161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	201
——兼与李泽厚和诸青年同行商榷	
新的建构 新的超越	245
文学的时代意识与时代的文学意识	250
文学是人学新论	255
在死亡面前的人生观照	288
——关于文学是人学的一点思考	
《猫城记》与《城堡》的比较	309
人格力量·悲剧意识·艺术感觉	319
——老舍小说初论	

目 录

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	350
——文学语言学初探	
略论小说的故事性	374
论小说语言的故事功能	379
后 记	398

高 加 林 论

似乎还没有结束痛苦的孕育过程，他便满头大汗地从人生的沟沟坎坎里走出来，疲惫不堪地站到人们面前。有人说他是利己主义的奋斗者，有人说他是社会主义的农村新人，也有人说他是成长中的农村知识青年，说他是……他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

他叫高加林，陈奂生、冯幺爸们的儿子。他的出现是那样的令人感兴趣，以致许多评论中篇小说《人生》的文章，都从惊叹这一形象的成功说起。然而，本文却是从谈论这一形象塑造的不足及其原因开始的。

—

考察一下高加林匆匆忙忙走过的人生历程，可以发现其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戏剧性。

他在起步之前，是公社小学的民办教师。虽然作者没有细写他的高中毕业分配，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他父亲是县武装部长或者商业局长，他也许会幸运地走进县广播站、副

食品门市部等等，从而被纳入别一种人生轨道。然而他父亲是一个地道的血统农民，于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原则相当合理地（因为它存在）标出了他人生道路的起点。也许他不满足，但他不怀疑这种安排的天经地义。只是当大队书记为了安插儿子而将他逐出校门时，他才愤怒了。屋外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窑洞里，老两口痛苦而无奈地望着心爱的儿子。高加林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迈出的第一步是：从学校到土地。

在七十年代初，这一步意味着巨大的光荣和骄傲，然而在八十年代，注重实际的人们尽管习以为常却不能不承认，这意味着经济地位尤其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种下降因迫于权力的意志而显得更不公道。对此，作为当事人的高加林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在这里，我们听到作者借此奏出的是强者性格的基调。然而，接下去的反抗主题却令人失望：他写出一封要求在部队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工作的求告信，决意在社会面前与权势者比个高低。这种因遭到权势打击而乞求更具威力的权势与之抗衡的戏剧性，酷似被剥夺革命权利的阿Q向往的革命理想——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云云。两个反抗者所追求的都是他们的冤家对头已经得到的，只是因社会和时代条件而异罢了。这种戏剧性呈现出的是极其深刻的悲剧性。遗憾的是，以后的故事发展不是从这种悲剧性上开掘下去的。

作者这样设计了高加林的第二步：先花两个章节渲染他的“落魄”以及持篮子上城卖馒头的耻辱感，再将笔锋一转，推入一个“根本不象农村姑娘”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带给他爱情慰藉。一部人生悲喜剧于此平添一重恬静的牧歌

色彩，理想的少女，还有跟少女一样理想的画面：月光，小路，绿色的庄稼……然后再进入第三步。

在爱情中陶醉了一阵的高加林，因为一次到城里装粪肥所受的屈辱，曾经愤愤地坐在河边，“眼睛里转着泪花子，望着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结果——卖火柴的小姑娘划亮一根火柴，得到一个美丽温柔的梦；失意中的高加林发了一个誓言，当天晚上就收到一封能使他如愿以偿的来信：当副师长的叔叔回来了，职务是该地区专署的劳动局长。借了这位地位显要的叔叔之手，作者将高加林一把拉上了另一个生活舞台。他成了县委大院里的通讯干事，踌躇满志地一面创造一面享受着簇新的生活。他冲到灾区第一线写报道，在报纸上不断发表通讯散文，挂着闪光灯、照相机到处抛头露面，还有机关篮球队主力，还有食堂女服务员的宠儿……与此同时，他又得到了一个名叫黄亚萍的姑娘的垂青。第四个转折在这姑娘的垂青之下悄悄地来临了。

黄亚萍是一个县委干部的女儿，县广播站播音员，高加林学生时代的同学。聪明，大方，当然还有秀丽，和高加林一样爱好文学。高加林在县城里的出现，使她原来的男友相形见绌。因为他在她眼里是如此的潇洒：“顾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明亮，有点象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象电视剧《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而黄亚萍本人则在作者笔下扮演了冬妮亚的角色。不过冬妮亚爱上保尔那会，保尔是一个爱打架的穷孩子，而她的爱上高加林，则限于对方脱离农村的时候。